

天性:如梦八十秋

张化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性:如梦八十秋/张化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116-0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423 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30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页 17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16-0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张春风

我和父亲的缘分始于1972年6月22日。那天他参加一位意外暴死的同事的葬礼，没想到那边死人刚下葬，这边几乎同一时间我就呱呱坠地了。那时候父亲已经年届不惑。此前他是个什么样子，尽管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时能从他的回忆中加以揣摩和想象，但真正能够更完整地填补我脑海里这段空缺的，还是他的这本自传体式的独白。

人的一生犹如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席菜。有些人活得乏味，十年如一日；有些电影荒唐，看得让人犯困；有些菜做作，食材不行只好靠拼命往里加料。父亲的这辈子，却无需修饰点缀，就是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书，一部精彩的令人难忘的电影，一桌鲜美可口的大餐。这当然跟他书中所说的天性有关，一切都可以说是他的天性和身外那个世界碰撞的结果。一副激烈的性格，一颗诗人的心，逢着一个动荡的年代，产生的必然是戏剧性的人生。

在这本书里我像读一个陌生人的故事那样认识了一个聪明顽淘的小少爷，一个孤苦倔强的美少年，一个勇敢幽默的青年战士，一个英俊浪漫的大帅哥。再后来随着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又做过农场工人，海岛渔民，县城记者……时间和地域的曲线带我一路走过抗日战争时的四川，湘西剿匪时的张家界，抗美援朝时的朝鲜，政治运动时的海角边城。这些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和没有久居过的地方。我一边读一边不禁感叹：哦，这个可爱有趣的人，有一天将成为我的父亲，从那里开始我们的父女缘。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由不同的人去看，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从父亲的年轻版本去重新认识父亲，这对于我来说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父亲让我替他的这本大书写序，我毫不犹豫地应允了。既然这是一本讲真话的书，那么最搭配它的当然就应该是一篇吐实言的序。我不是

文人，也不是名人，可是我也许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胜任这件事情，因为我不仅了解父亲，热爱父亲，而且无所顾虑，敢想敢言，不会缩手缩脚，没有条条框框。

父亲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念完高中，就参军去了。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尽管日后自学成才，并且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然而不能在履历表上的学历一栏填写“大学”二字，恐怕仍然是父亲心中的遗憾。其实他当年成绩优秀，头脑灵光，如果选择的是考大学这条路，是不会走不通的。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可是在这里我想说的却是，在我个人看来，他没有读大学非但不是憾事，相反恰恰成了他这本大书之幸。正是因为没有步入大学的殿堂，重复千万人走过的路，才使得他这部八十年的电影如此独特精彩，如此值得一看。

一个再好的作家，如同一个再出色的厨师，同样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好的材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创作的自由。沈从文在写他儿时的经历和所生长的故乡时是不折不扣的大师。这不仅因为他是“巧妇”，也因为他的经历和故乡充满特色，还因为他的心灵拥有充分发挥的自由。也就是他不光能写，还有得写，和敢于写。我时常跟父亲说：你的经历堪比沈从文，只等款款落笔，娓娓写来，犹如刚捞上来的女神蛤，不需要过分添加调料，轻轻白灼一下就美味无比。其实他的经历，比沈从文还要来得丰富。

老实说，直到病中的父亲完成这本书，我一直替他感到遗憾的，不是他没有读过大学，而是没有享受过内心真正的自由。一个人不敢说想说的话，不敢做想做的事，这比没有读过大学要悲哀得多。永恒的作品在我看来没有阶级，没有立场，没有对错，没有中心思想，无意于传递任何个人信息和政治口号。读者有自己的想法，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读者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哭还是笑，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父亲虽然有着一副不羁的性格，却在许多方面又是最胆小的。他仿佛时时活在忧惧中，忧惧什么，也许只有他们那一代的人才最清楚，也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甚明了。这忧惧心不知道是不是经历磨难后留下的一点后遗症，如果是也不能算为奇怪吧。这就是人，一个真实的人。这本书，让我看到父亲曾经如何受束缚地过日子；而这本书的完成，又让我看到他如何解放了自己，重获心灵的自由。不追风，不随潮，只是忠实地讲述这辈子值得一记和有趣难忘的故

事,这是多么舒畅的事情。

我总觉得,凡是真实的,里面就会有美。如果有上帝,他也会仔细聆听。

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很深,把他看作英雄。成人后因为经历过的日子,见过的世界,读过的书,接触过的人,使得我对父亲的教导有不少悖逆之处,许多地方有了自己的新见解。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父女情。许多记忆,在我的大脑深处温暖地保留着。我从小喜欢拿气球砸在他刚硬的头发上,听其发出清脆的“嚓、嚓、嚓”的声音。父亲年迈后,头发白了,稀疏了,也变软了,竟能从中闻出一股婴儿的味道,倒依然笔直地竖着,我却早已过了喜欢气球的年纪。父亲年壮时因为急性子上楼梯总是一次迈三级台阶,而且早早就把钥匙拽在手里,在家的我远远就能听出是爸爸回来了。年届八旬的他,上楼不得不一步一步慢慢地上,却还是一样早早地把钥匙拽在手里。每次家里吃沙田柚,剥完的柚子皮,父亲都会调皮地戴在头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直到年老,也还是这个样子。父亲特别喜欢出游旅行,他说他喜欢坐车的感觉,喜欢汽油的味道。一坐上车他就像个快乐的孩子,眼睛里放着光彩,兴奋无比。我想到他的一生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旅程,那颗好奇的脑袋总是探出窗外,时时寻找新奇有趣的景致和事物。知道父亲对经历患难的故乡东兴怀着极深的感情,哥哥有空总喜欢开车带着我们故地重游;沿着北仑河走走,吃吃海鲜,钓钓鱼,听听东兴话,看看东兴人。这样的出行总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

这些小事情和微薄的感受不在他的书里,却在我这里存着。我知道不管我走多远,人格多独立,思想多自由,我永远是我父亲的女儿。

父母一生经历诸多磨难,却又屡经命运和上天的看顾,这很神奇。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底气和运气,才没有在战场上战死,在饥荒中饿死,在政治运动中给整死,在流放中抑郁而死,在一次次疾痛中病死。经历过这些,还能够把这些写下来,跟天下人分享,这又是怎样的福气。这样一说,就又把读者引回到这本书里了,因为只有读了它,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才能够满足大家的好奇。

如此顽强的生命,自然有其影响力。要说父母这一生给我和哥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也许就是他们快乐真率的本性和对生活不折不挠的热情。他们经历的苦难和折磨,不但没有使他们消沉,反而使他们像两

朵向日葵，每天微笑绽放；就是有一天凋谢了，我相信也是朝着太阳的方向。有这样的父母，我们也就不敢懈怠，不敢放弃，不敢蹉跎，只有努力地往前走。

父亲这本书于家人有特殊的意义，于陌生人又有另一番价值，总之我相信不会枉费他的心血。其实我自己平时读书很少读序言的，尤其那些冗长的摘记和文风方面的评论，更是不会去看。于是告诫自己不得啰唆，不要沉湎于长篇累牍的赘述，于是就写下这么一些零星的感受，是为序。

2012年12月1日于美国波特兰

前言 唉,天性如此……

电影是制造梦幻的工厂。在人生长梦中,每个人都是编剧和主角,天性则是主宰这部巨片的总导演。

我凭着天性,尽情地自我表演,原汁原味,不需要化妆打扮,不需要背诵台词,更不需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一眨眼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又一幕生动自然的活剧。整整八十个春秋,总算略微品尝到了一些人间的七情五味……

虽然,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完全理解,但毕竟是过来人,该盘点一下了。

也许旁观者清。

首先必须郑重申明:这只是一个平凡人并不平凡的传记文学,它不是刻意虚构的长篇小说或电影故事。主人翁就是我这个无名之辈和我的亲人好友,故事主线就是我一辈子走过的生命历程,书中的人物均为我所识所见。

人走到生命的尽头,能毫无顾忌地回顾和反思一生,是一种涤荡心灵的洗礼和享受。这时,已无多少后顾之忧,其言也善,其言也真;也许有未能尽言的真话,但绝无半句无中生有的谎言。

这本书,忠实记录了我这匆匆一生,天性在“党性”和各种因素制约下起伏发展的曲折弦线。

天性决定命运。在人生路上,每一步我都力图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最终都不由自主地落入命定的归宿。悲欢莫测,听天摆布,有喜剧也有悲剧。

当然,人是社会动物,天性绝非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形成的因素十分复杂,既离不开祖传的遗传基因,也离不开生活成长的社会生态环

境(家庭、社会和时代)。

我出生在一个门第虽不显赫、但极富中国传统和带有点儿“国际性”的书香之家。亲属中,有留日的、留美的、留德的、留英的、留法的和留苏联的,也有土居偏乡僻壤的“草民”。国内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我们家族带来或悲或喜、或祸或福的微妙影响。特殊的处境,赐给了我特殊的遭遇和独特的视角。

兄弟姐妹五个中,唯有我是没念过大学、没留过洋的“土八路”;走了一条“留朝”(抗美援朝)和“留边”(下放中越边境)的人生之路。

八十年来,我有幸当过小少爷,当过流浪儿,当过工、农、兵,当过祖国的宠儿——“最可爱的人”,戴过钢盔,戴过竹笠,戴过七品“乌纱帽”,戴过诗人的“桂冠”,戴过“优秀共产党员”的光环,也戴过“右派反党小集团”的黑帽子;亲历过四次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自卫反击)、三次病危、两次下放、一次困难时期和数次政治运动。从考场到战场,从农场到文场,从官场到市场,从偏远的边疆海岛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从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人生的轨迹遍及天涯。习文从艺凡六十余载,学习过吹拉弹唱、摄影画像,尝试过诗歌、散文、小说和歌剧、话剧、影视剧等创作……一切风雨坎坷、荣辱艰辛的传奇经历,以及家庭的亲情和矛盾、荣耀和悲酸,无形中使我积蓄了强烈的写作冲动,为这本自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这些经历就是我无法放进“存折”的唯一珍贵财富。不久于人世之时,我舍不得把它抛弃,也无法把它带走,不得不搜肠纪事,将它储入浩瀚文库,敬献后人。

我不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也没有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这部凡夫小传不靠祖传的虚荣和“名人效应”招摇,也不以华丽的“时髦包装”哗众取宠。

至于我的外貌,倒有点像电影中扮演爱国英雄邓世昌的老艺术家李默然。在北京开剧本创作会时,他住在我斜对门,每次会面,我们都要互相打量,但一直没有机会说穿。有一次在海口,一个妇女牵着个八九岁的女孩,追着让我签名。我受宠若惊,再三申明我不是李默然,她们仍不相信。我只好说,你看,我年龄比他小,眼睛比他大,脸上没有那么多疙瘩。她这才不好意思地回头望着我,半信半疑地离去。

这“影片”如果能有什么引人入胜的魅力,也许来自“真善美”的生活

本色,来自戏剧性的坎坷人生,来自坦直吐露的绝密隐私,来自良心的发现和无情的自我解剖,来自禀性难移的千古自然规律。这些隽永的新鲜感,也许才是不会和别人雷同的。

把这部“故事片”归于“传记文学”,则是因为它如实记录了一个普通业余作者,中邪似的献身文艺的一生(包括文艺创作的沉痛教训和严肃思考);如实描绘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这质朴鲜活的纪实人物群像,将会以他们“原生态”的风貌走进文学殿堂。它不是小说,酷似小说;不是历史,却在一定程度上,从新的角度折射了我国的近代史。

我充满传奇色彩的丰富经历,本来足可写成多部长篇小说或感人的电影。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只需稍微调整或虚构,就会非常集中,非常“高于生活”,非常理想和精彩。但是,精力有限,岁月不待,我更不能忘记这是纪实性自传,真实才是它的灵魂,不能为取悦读者篡改史实,所以,毅然放弃了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尝试。尽管故事对某些是非并未匆忙地妄作结论,也没有刻意设计传统的“大结局”,但相信旁观者清,只要忠实地记录了事实,不同的结论和答案,就在不同的读者心中。如果,将来有哪位别具慧眼的大师,能从这些原始生活记录中发现精华,获得创作灵感,创作出真正的电影,那就万幸万幸了!

我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平庸作家,笔耕一生,成果羞涩。这无拘无忌的绝笔之篇,也许将是我献给读者最无愧的倾心之作。

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宏大工程动工太晚,任重而道远,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近年来,我深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和痛风等多种顽症的折磨困扰,依赖两个心脏支架和大量药物维持着生命。不料,写作刚刚开始,2009年8月,在美国波特兰探亲期间,我就突发中风失语。幸亏女儿察觉,及时抢救,保存了记忆,却部分忘记了拼音。不得不顽强地从头苦练,敲打数字方得一字,继续向既定的目标缓慢攀登。2011年又两度住院,安装了起搏器和加装了三个支架,几乎把我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才得以苟延残喘。风烛残年,老病缠身,全靠相濡以沫的老伴,倾尽爱心,艰难地搀扶我蹒跚前行,投入这今生的最后一战。

不少好心的亲人和朋友,劝我以健康为重,搁笔洗手,颐养天年,享受最后的潇洒和快乐。但生活告诉我,人到暮年,回望来路,品味人生,重温青春,尽抒真情,这正是最大的潇洒,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满足!这也正

是一种忘却烦恼、延年益寿的最佳“精神疗法”。即使哪一天精力耗尽,猝然扑倒在计算机上,我也会像战死沙场一样问心无愧地含笑而去,无憾无悔!

呜呼!落日依依催行人,黄昏正是赶路时。不知道前面还能走多远?不知道后面还能写多少?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这梦中的“盖棺计划”?……好了,还是抓紧头脑清醒的最后时光,快些敲打键盘向前赶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啊,宿营地已经遥遥在望了!

衷心感谢您耐心地读完这篇推心置腹的“前言”。

唉,天性如此,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就请以看电影的心情,来读我亲历的故事吧!……

第一章 顽童奇遇(1933—1949)

1 巨婴“张老三”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很多熟悉的朋友，至今也说不准我这个张老三是哪里人。草木皆兵的年代，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说是贵州人，又话带巴蜀腔；说是四川人，却出生在南京；母亲和全家解放后又都住在北京。越讲越复杂，三言两语讲不明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过去填简历表，我照例填写父亲的祖籍贵州省水城县。而我童年在重庆上学，从那里参军，满口川音，心里早把四川当成了家乡。如今，办出国护照时才按“国际惯例”将籍贯“拨乱反正”，明确了出生地点是：江苏南京。

其实，我对南京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只知道半句南京话：“乖乖隆的咚”——那还是儿时从一个南京籍小保姆嘴里捡来的。

我出生在公元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26日。

癸酉年是一个很不吉利的鸡年。那年，全世界动荡不安，鸡飞狗跳，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国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四川茂县大地震，日本占领了山海关，蒋介石却亲自出马，连连发起了对红军的“围剿”。但也是那一年，留日归来怀才不遇的父亲张连科，在军政部兵工署当研究委员期间，得到了一个跟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一行到世界各地考察工业的机会。周游了全球五大洲，辗转半年多时间。

正当父亲考察抵达美国华盛顿那天，收到了一封南京发去的电报。电文是：“老三2月26日顺利出世。男，重十斤三两(十六两秤)。母子平

安，望速命名。”落款是陈素琳。

陈素琳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心灵手巧、柔中有刚的典型中国式贤妻良母。

父亲和母亲的戏剧性结合，因应的恰是我国颇具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的“半包办、半自由恋爱”的一种婚姻模式。

祖父叫张开甲(字庚先)，是贵州省水城县场坝乡开小盐铺兼办私塾的开明乡绅。父亲张连科(字重山)是老大，自小聪颖过人，文理双优；年轻时就穿着草鞋、啃着烤土豆到省城贵阳南明中学求学，毕业后先后在水城、威宁、贵阳等地教了几年书。1922年贵州省招考公费留学生，他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赴日勤工俭学。先念大阪高工，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照有一半身像，分寄国内友好，像上题词：“卧薪尝胆，勾践灭吴；闻鸡起舞，刘琨逐胡。”可见他八年异乡求学，不忘报国之志。他身材魁梧，皮肤微黑，仪表堂堂，留学期间倾倒过不少多情的日本姑娘。他珍藏的一只小酒杯(我叫它“圆梦杯”)，斟上美酒，杯底的明珠上就会油然浮现一个微笑的日本女郎。母亲后来把那只酒杯传给了我，开玩笑说，那或许是父亲青年时代难忘的日本女人。

有情无缘也枉然。父亲和母亲倒是有情又有缘。那年，父亲在南京参加贵州同乡陈廷纲(后来我的四舅)的婚礼。陈廷纲出身贵阳书香世家，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机要科长。父亲在他家墙上的一张照片里，偶然看见一位怀抱琵琶的时髦姑娘，鼻梁高高，眼窝凹凹，穿着旗袍，大方时尚，既有西方女性的浪漫，又有东方女性的温存，颇有好感，禁不住脱口问了一句：“这美人是哪家闺秀？……”

陈廷纲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爽朗地笑说：“不瞒老兄，这就是我家五妹。我还有一个二妹，也是贵阳女子师范毕业的优才生，才貌相当，正想来南京谋职。老兄如不嫌弃，我愿意尽力做此月下之媒。”而立未娶的父亲，自然满口答应，当即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冥冥之中，一条连接我生命的红线，就这样遥遥地牵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当陈廷纲二妹陈素兰在五妹陈素琳陪同下，从贵阳千里迢迢来到南京相亲的时候，父亲竟然一眼就看上了比他小十岁的漂亮妹妹陈素琳，对精心打扮的女主角姐姐陈素兰却无动于衷，弄得当哥哥的

媒人好不尴尬，一时间没有了主意；两姐妹也涨红了脸，无言相觑，久久地愣在那里。

真情难却，天意难违，爱情之可贵，正因为它不可替代，不可更换。

好在素兰和素琳姐妹均为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从小感情很好。互相谦让一番之后，姐姐知趣地退出了这场“角逐”，鼓励妹妹当了新娘；她则默默吞下眼泪，强颜欢笑地充当了妹妹出嫁的伴娘，并且陪伴妹妹看大了两个孩子，把亲人的幸福当成了自己的幸福。后来，这个高尚的老处女，果然独身到老，终身未嫁，回贵阳默默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受到了我们全家的敬重。

父亲和母亲可算得天作之合，相亲相爱，互相体贴，互相尊重。他们为儿女取名字有个默契，一定要在父名(连科)中取个“车”字，在母名(素琳)中取个“木”字。大哥名叫辅枢、二哥名叫轶东，后来抗战中出世的妹妹名叫辉柟、小弟弟(毛弟)名叫轴材，就是出于这个男女平等的恩爱协定。

本来，有了两个男孩，父母一心想抱个千金。怀上老三后，他们怀着这个甜蜜的愿望，曾冥思苦想，设计过不少秀气的闺女名字。我这个“不速之男”的贸然降临，使他们措手不及，打破了原来命名“车木结合”的默契。父亲为了纪念华盛顿之行(华盛顿的生日是2月22日)，回电将我取名“华盛”，其中显然也有希望中华繁荣昌盛的意思。我这个超重的巨婴，腿臂肥如一节节嫩藕，长得健壮可爱，当年摘得首都南京婴儿比赛第一名的桂冠(奖品是一罐美国克林奶粉)，给家里连连带来了吉祥和好运。不久，父亲回国后被任命为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厂长。我们举家迁居上海，住进了法租界霞飞路的小洋楼，坐上了小轿车，过上了贵族生活。

但是，好心的爹妈万万不会想到，“华盛”这个洋气的“进口名字”，后来给我这个“张老三”留下了多么沉重的政治包袱，带来了多少有口难辩的烦恼！二十年后，在抗美援朝前线炮声隆隆的坑道里，我发表第一篇文学学习作的时候，才开始改成了“化声”这个名字。天长日久，笔名渐渐取代了原名，但却无法抹掉档案中那个记录在案的时代烙印……

2 “猴性”难改

人的天性(个性)主要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

这个问题各有高见,不同的阅历,有不同的结论。

我的“人之初”,就和那些听话的乖孩子们并不太“性相近”,从小像一只好奇好动好冒险的野猴儿,到处捣蛋惹祸,被妈妈称为“猴三”,说我“除了身上无毛,就和猴儿一样”。

民间概括妇女生养孩子的体会说:“老大慌,老二忙,生了老三会当娘。”我这个“张老三”,就是选择了母亲最有哺养经验的时刻来到世上。大哥比我大两岁半,二哥比我大一岁半。他们俩的生日是同一天(8月28日)。母亲在四年里连生三胎,体力和精力本来难以招架,但当时家境比较富裕,三个孩子都有用人照料,她无需过分操劳,加上“正逢夫君得意时”,心情开朗,营养良好,奶水充足,我吃母乳直到一岁零三个月。这种特殊化的优惠抚养,既对我的早期发育十分有利,也加速了我稚嫩血管里过剩胆固醇的沉积,从娘胎里就开始走向了未来的冠心病。

生下来就戴上“冠军”桂冠的天然优越感,以及家人对幺儿的娇惯,世人对厂长少爷的奉承,给我铺了一张病态的温床。如此的社会生态环境,婴幼儿时期便对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夸我“漂亮”,夸我“聪明”,夸我长得像个“洋娃娃”(其实是夸妈妈),甚至对我的顽皮野性也加以赞扬……奉承声中,我成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孩子,从小就爱招灾惹祸。两岁时口含一块积木吐不出来,几乎憋死;三岁时钻进饼干筒去舐吃饼干屑,头退不出来,差点儿窒息;四岁时,在法租界公园的草坪上,和一个小洋人争夺玩具扭打起来,他用洋文叽里哇啦地骂我,气得我揪住他的黄毛大骂:“ABCDEFGH! AAA, A个屁! ……”这些儿提趣事都说明了,不论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无,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环境,无疑都是创造和改造个性的重要条件。

父母生下了我,也生下了我的天性。

父母养育了我,也养育了我的性格。

性格是与生俱来,也是自己无意塑造的。

五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家早年在南京购置的一座小楼房也毁于日机的轰炸之中。“八一三”事变后，父亲临危受命，率领爱国职工，冒着敌机封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往内地抢运上海炼钢厂的重要设备。先搬到汉阳与汉冶萍公司合并，后又迁到重庆上游三十里的大渡口，建设大后方抗日支前的钢铁基地。大敌当前，深明大义的年轻母亲——一个刚三十出头的女人，独自带着我和两个年幼的哥哥，随着拖儿带女的难民潮辗转内迁，先回到贵阳娘家暂时避难。

外公陈鉴湖是前清贵州最早赴东洋留学的教育家。我的几个舅舅，有的留学英国，有的留学日本，有的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祖传的家业虽已破落，家境依然小康。生活在那个幽森古老的庭院，仿佛在动荡中踏上了一块安定的绿洲。由于外婆早年病逝，我在家中无人照料，五岁便提前背起书包，随着两个哥哥一同进入了当地著名的正道小学。过早入学，朦朦胧胧，生活在一群智力和体力都比自己成熟得多的同学中间，既促进了我的成长，也给我精神上带来了不小压力。

这是一所管理极严的贵族学校。学生要剃光头发，穿灰色的制服，上课稍微迟到，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在同学中间，暗地里存在着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以老欺新的现象。上学第一天，我就遭到了一位同桌大个子同学的欺凌。在厕所的小便处，他要我和他比赛谁把尿射得远，射得高。谁输了就要舔对方的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便学着他把小麻雀摆弄得挺硬挺硬，憋足劲儿对着厕所的墙壁射起尿来。结果，我因包皮过长，射尿时龟头前不时鼓起一个小包，当然吃了败仗。我不服输，只舔了自己又咸又苦的尿，死活不肯舔他的尿，两人因此扭打起来。我被打出了鼻血，扯掉了纽扣；在学校不敢出声，回家也不敢说。从此把上学视为畏途，书包变得格外沉重，总是想千方百计借故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也常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越过“楚河汉界”。老师讲的功课，至今在我脑海里全然一片空白，好像什么也没有学到。人生的启蒙课，却让我隐约懂得了弱肉强食这个残酷无情的道理。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空袭贵阳，警报频繁，人心惶惶。有一段时间，人们白天多不敢留在城里，学校也暂时停了课。我们天亮前便要叫起床，匆匆吃罢早餐，用饭盒带着午餐，赶在日出前疏散到郊外的山坡上去，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敢回家。就是这样仍不放心，母亲还特地买了一些

草绿色的棉布，准备当敌机空袭时盖在身上作为伪装（这批布后来由母亲缝制成了我们童年的主要衣服）。这种早出晚归的逃难生活，折磨苦了年迈的外公和劳累的母亲，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却是快乐的假日和郊游。这样的日子，我们可以不去上学，不做作业，到郊外的荒山野岭去遍地打滚，尽情撒野，抓蚱蜢，扑蝴蝶，采摘刺苞和各种野果；无拘无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享受片刻童年的个性解放。

一年多后，重庆大渡口新建的钢铁厂投产，炼出的钢铁开始制造成大批武器支持抗日前线，还生产了一些五百磅的炸弹，投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后方基地。父亲安顿好工厂的事情，才抽空派警卫大队队长王典则，坐了一辆小轿车到贵阳，把我们接到重庆大渡口的工厂新址，在篱笆糊黄土的临时宿舍龙华里一号重聚一堂（后搬高昌里一号），共渡国难，过起了清苦的“抗战生活”。

刚来到严厉的父亲身边，进入新办的钢铁厂职工子弟小学，我还算得一个安分向上的好学生。端午节看赛龙舟，我在长江边的河滩上捡到一只带纯金挂链的怀表，当即有人抢着出高价收买，我却拿着金表飞跑回学校，交给了老师。失主给学校写了感谢信，还上门送给我一盒当时极为稀罕的饼干。学校和家人对我拾金不昧的良好表现也大加赞赏。

那时，钢铁厂正在紧张迁建，到处都是工地。工人们像蚂蚁搬家那样，用滚木搬运着巨大的机器。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的号子声回荡在长江之滨。父亲秉性沉静，不嗜应酬，喜怒不形于色，孜孜不倦，埋头苦干，是个爱国敬业的技术官员，重要设备的安装事必躬亲。他终日穿条背带短裤，戴顶草帽或通帽，和汗流浹背的工人们滚在一起。妈妈担任抗日妇女工作队的支队长，组织职工家属们忙着为前方将士缝寒衣，做军鞋。父母都无暇来管教孩子，这也给我这个“猴三”提供了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

俗话说，“三岁四岁逗人爱，七岁八岁狗都嫌”。果然，二年级以后，我顽皮放纵的“猴性”，也“与时俱进”，进入了一个劣迹斑斑的“作案高峰期”：

——刚学了两页历史，便和邻居医院院长的儿子陈关福，点着火把，爬进一座阴森的古墓，妄图在骷髅和白骨中，寻找“青铜宝剑”。一无所获，却意外打死一条菜花蛇。听说蛇皮做的皮带最凉爽，就剥下蛇皮扎在

腰上，直到长满了蛆虫，臭得妈妈捂着鼻子作呕，才暴露了“探险”的秘密。

——和四川同学吵架，大骂“龟儿子”，被级任老师在嘴边画了“红圈”。按规定要带回家去汇报，不然第二天罚画双圈。我在路上偷偷洗掉，翌日清早，翻窗进老师办公室，自己重画了一个“红圈”，不料错拿了蓝墨水，闹了一场大笑话。

——学了几句“之乎者也”后，心血来潮，斗胆磨墨提笔，搭着板凳，在客厅悬挂的名家条幅（王维《山居秋暝》）最后一句后面，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也”字。气得父亲捶胸顿足，哭笑不得，将我一脚踢出家门（把他的皮拖鞋都踢飞了），罚我连夜用正楷抄写这首唐诗十遍（我也从此感到了诗的神圣）……

进入职工子弟中学后，我的“胡作非为”也随着升级，跨上了另一个新台阶：

——化学老师带队到工厂化验室搞实验，我好奇地趁机想试试氢气是否真能“自燃”，竟违章偷偷把酒精灯放在制造氢气的瓶口，顿时引起爆炸。轰然一声巨响，试瓶炸得粉碎，一块玻璃划破了我的下巴，鲜血直流，吓坏了老师，差点酿成大祸（至今我下颚还留有无知的伤痕）。

——英文课的老师姓花，是个留美的摩登女士。我给她取了个绰号叫“花摩登”。她很生气，早想寻机收拾我。一天上课时，我请假出去小便。她不大情愿地“恩准”道：“去吧，去吧。”我高兴地一边往外跑，一边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剧《棠棣之花》的主题曲：“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她狠狠地叫住我：“站住！什么‘兄弟’？你才多少岁？……”我站在门口，被尿憋得直扭屁股，小便几乎流了出来，她才勉强挥手放行。

——学校负责敲钟的校工，是个刚来的乡下人，厚嘴唇、小眼睛，做事笨手笨脚，外号“猪八戒”。有一天，闹钟慢了，他正在笨拙地摆弄，我上去自告奋勇地说：“我会修。”于是，就像平时在家里一样，掀开钟壳，用铁钉乱拨了起来。不料油丝拨断，闹钟完全停摆，到了下课时间，也忘了敲钟。降旗的时候，教务主任喝令我站上土台，拉着陕西腔气愤地说：“同学们，今天放学晚了半小时，因为我们学校唯一的闹钟给人摆弄坏了。这不怪敲钟的‘猪八戒’，全怪这个不懂装懂的‘孙悟空’（指着我）！……”全场顿时哄笑起来，主任也笑了。我低头站在旗杆下，一时忘乎所以，忍不住扑哧地跟着大家笑起来，笑得直不起腰。后来，多亏同校的二哥“包庇”，谎